

論「天時·地利·人和」

紀庸

這是孟子上面的兩句話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。孟子是主張王道主義的，王道的意思，就是不以武力征服別人，而以仁政感化別人，所以他特別注意到「人和」的條件，說現在的話就是受羣衆擁護。有了羣衆，即使沒有險要的「地利」和好運氣的「天時」，也可以完成王道。

聽到三國演義故事的人，都有一個觀念，曹操得天時，孫權占地利，劉備得人和。這正表示羣衆同情了劉備，因為在三國分立的條件中，曹操的地方最大，劉備的領土最小，但劉備居然可以抗拒了曹操的壓倒優勢，這是爲了什麼？一定是有羣衆。事實上我們考查一下那時代的地理環境，劉備所據的「巴蜀」，所謂「天府」之國，出產豐富，山河險固，進可攻退可守，何嘗不是地利呢？孫權「三世有東吳」，他父親哥哥全是江東一帶的大封建領主，大的地方勢力，有同鄉的關係，親友的關係，這個宗派觀念有多濃厚，難道不是人和嗎？至於曹操，利用了他們的政治手段，占據整個黃河平原和淮水流域，以地利條件說，再沒有比他更充分的了。即以人和而論，他用金錢利祿收買了許多文人策士，他們全會給他效力奔走，當然也算有了些羣衆，如此說來，天時地利人和的說法，是不可以孤立的，與其說是古人條件，不如說是我們理想中的條件了。與其說是唯一的條件，不如說是重點條件。

再進一步分析，「天時」，就是時運，在今日這是不成問題

了，因爲這是封建時代的迷信，一方面是人民大眾還沒有充分的知識，一方面是歷史人物的利用羣衆弱點，所謂「歷史循環論」，「帝王符命說」之類，全是基於這一點出發的。從秦漢以來的專制封建帝王起，直到民國以後竊國的大盜袁世凱止，全是把這套手段來愚弄羣衆的，而羣衆也有好多人樂得受愚。主要還是那些幫閒幫凶的士大夫在宣傳粉飾這些「不經之談」，更加强了人民的迷信。皇帝是「真龍」，宰相也許是「文曲星」，大將就是「白虎星」，你愚笨的人民怎末會有資格反抗？若是皇帝渾賬了，（皇帝十分之九是這樣）第一是「君王明聖臣罪當誅」，第二是「遭劫在數，在數難逃」，老百姓的夙命論打擊了他們的反抗意志，配合了他們落後的停滯的小農經濟。黃巢殺人八百萬，是劫數，李闖王作不成皇帝，是沒有那個命！這是解消人民起義最好的法寶，是鞏固特權階級統治的最有力咒，兩千年來，我們幾千幾萬萬農民，受够了他的欺騙，可是如今已揭破了這個秘密，我們開始掃蕩了此一封建符咒，廣大的農民，先進的工人，掙脫了自己命運的枷鎖不但自己革命，而且在領導全人類的革命了。這裏我們反而發現了許多知識分子，還不能洗滌清爽個人主義的機遇論，他們大半是在等待，在企圖不費吹灰之力而享受革命的成果。歷代的帝王，只要想成功，誰不求賢下士，把讀書人捧上三十三天？如果有一個看不起讀書人而遭逢失敗的，這就成了知識分子渲染的好材料。劉邦朱元璋本是窮苦農民出身，看不

起... 附錄的「謀略」，脫離羣衆，把農民革命一百八十度轉彎，成爲

又如諸葛亮六出祁山，北伐所以不能成功，主因也在山嶺重疊，

階級的一謀略」，脫離羣衆，把農民革命一百八十度轉彎，成爲農動不換黨的內戰，（當然，我們也得說這有社會的條件在內，不完全是人事關係）始而讀書人對他們是看成盜匪的，到這時候就捧成大軍大賈了。漢武帝爲了加強專制統治的下詔策士，朱元璋爲了雙奴才的太學美士，以及唐以後的制科考試，在讀書人看來，全叫做「遺逸明時」，「明時」就是表示自己已遇到好運氣，只要一動「胸羅萬卷」，自可「腰金披紫」，好像是沙磧裏的金子，閃閃發光，還愁遇不到識貨的人嗎？此種思想再發展便是投機取巧，和隱晦待時，街頭上的文王八卦攤子，星羅棋布，善觀氣色的相士，也大賺其錢，他們的生意建設在什麼上？就建設在知識分子的運命論心理上，他們不會自己製造或改革運氣，而專門等待三顧茅廬，或者等待「一時來運轉」，真是怪事！所以，「天時」一念，不能說因爲科學進步而完全消滅，更不能以爲革命來了就頭腦一新，我們應該相信今日大多數人還在把革命的本質，看成改朝換代，並沒有明白今後將是工農大眾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，他們還在作預時來運轉騎在人民頭上享福的美夢哩。

地理的因素不是決定歷史進展的絕對條件，這是歷史唯物論裏的基本規律。爲什麼？因爲創造歷史的主要因素是能夠創造生產品的勞動力，沒有勞動力，即使有多麼好的地理環境，歷史也難於發展的。可是過去的史學家卻歪曲的加重了地理因素，把他看成決定歷史的重點。這裏我們把地理條件分成兩類講，一類是指戰爭中的天險，一類是指建國的自然富源。戰爭進行中間，自然得把「險要」看成重要條件，中國歷史上有好多很驚險的局面，似乎都是被地理上的天險解決了的，仍以三國演義爲例，赤壁之戰，曹操的八十萬大兵居然被長江給擋住，淝水之戰，苻堅強調自

己的軍隊「投鞭斷流」，不料也斷不了。又如諸葛亮六出祁山，北伐所以不能成功，主因也在山嶺重疊，交通不便，給養不能接濟，這也是地理上的險要問題。可是我們再提高一下，這種條件是不是絕對的呢？假使是絕對的，東吳和東晉應該永遠亡不了國，因爲長江的天險永遠是他們的，巴蜀不能進攻別人，別人也應該沒法子進攻他，然而王濬的樓船，居然使「金陵王氣黯然收」了，鄧艾偷渡陰平、西蜀的君臣也祖傳與羈而投降了，天險的條件，又那裏靠得住呢？古遠的史實也許我們缺乏趣味，拿最近的例證來說，蔣介石政權何嘗不以長江爲天險呢？他們更比東晉東吳的條件美備，有砲臺，要塞，又有海軍空軍，這些全是解放軍沒有的，理當解放軍永遠渡不過長江了，可是不到三天工夫，解放軍不但渡過天塹，而且席捲了京滬線，難道這全是奇蹟嗎？解放軍真的呼風喚雨的軍師嗎？大家一定會回答一個「不」！——這充分證明了天險不是決定戰爭的絕對條件。

物質環境對於建國的重要在表面上是不容否認的。我們的歷史上常常自吹自擂地說：「中原文物之邦」，而把邊疆人民稱之爲「蠻夷」「荒徼」，中原爲什麼有文物，這是地理條件呀！邊徼爲什麼蠻夷，也是地理條件呀！我們在歷史原理上有許多類似的原則，什麼雙子河是文化的溫牀，三角洲是人類進步的基地呀等等，我們沒有理由把它完全推翻，可是我們卻萬萬不可以信以爲有了這般天然環境就會有進步的文化；一切文化由人類的勞動創造，沒有人類的勞動，多麼肥沃的土地也不會長出穀物的，越樹理有一篇小說「地板」，諸位同學想已讀過，這是說明勞動條件的最好作品，把地理條件作爲文化優秀絕對條件的說法，該當是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庸俗的學者給統治階級保駕的，好像美國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發展得最兇的國家，爲了要壓制一切弱小

民族，便把地大物博來嚇人，什麼鋼鐵產量第一，煤油產量第一，糧食第一……一大串的第一，這種誇耀，無非是說，我有這龐大的實力，你們還俯首貼耳聽我指揮嗎？連我們中國過去那麼不爭氣，也很喜歡以地大物博自炫，——其實是阿Q，是自我麻醉。在古代，則其拿這個否定了少數民族，作為征服他們的張本。抗戰前後，因為感到這個地大物博的國家，竟不能抵抗區區三島的日本，學者們便又從種種方面強調我們是「地大而物不博」，油礦沒有啦，鐵礦煤礦也不多啦，這一類專滅自己威風的說法也很有一些人被蒙蔽了。假使美帝國主義者的自誇狂是爲了嚇倒他的崇拜者，那麼，我們對於地理環境的自卑感就養成了倚賴帝國主義者的軟骨病。試看最近因爲帝國主義者對上海的封鎖而感到困難沒有法子克服，天天在那兒害着恐美病乃至對美國害着相思病的人們，大約全是受了這個影響。當然，我們不自卑，也不自誇，像從前一些盲目的地大物博論者，或古來用夏變夷論者那樣。我們對歷史的進展主要還得看本身勞動力的組織作用怎樣，假如我們能够自發自覺的運用廣大人民力量，地理的條件，沒有不可以克服的。左傳上說楚國的祖宗「蕞路襟襟，以啓山林」，殷周的祖先，開發了黃河盆地，大規模種植農作物和收放牛羊，詩經上有好多篇是歌詠這些故事的，凡此種種，全證明了我們四千年文化，實在乃是勞動大眾的結晶，並不是江河湖漢自己會生產出來的。再看蘇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，曾長期受帝國主義者包圍封鎖，他們的地雖大，但一般人都會想到那冰天雪海的西伯利亞，不會對建國有多大好處，然而兩次五年計畫之後，不但在歐洲的蘇聯建設了重工業，普遍的提高了工農生活，即在寒冷的西伯利亞，也設立了沖天的煙囪，而且在北極附近，也可以把冰凍的小船拖下去而得到可觀的收穫。在封鎖條件

國作戰期間，西伯利亞尤其盡了莫大的責任，這樣的地理條件，更足以表示出來勞動的效能。

歷史的主人是誰？傳統的說法是統治階級。我們看：司馬光把他作的編年史叫做「資治通鑑」，這個「治」，就是統治者對人民的管制。用文言說，管制得好，就叫做「治」，不好就是「不治」。但不論好壞，其目的只是爲統治階級的少數人謀利益。這少數統治階級是隨社會進化的性質而有不同的。如果我們稍有社會發展史的常識就會曉得，奴隸社會時代的統治者是貴族，奴隸主，封建時代則是封建貴族，大地主，資本主義社會則是資產階級。也許在範圍上有擴大的趨勢，例如封建社會以來的士大夫官僚，也就是爬上了豪盤的知識分子，這一類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階級，數量是很大的，蒲韞先生的「二千年間」有過統計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，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數目更大於士大夫，不過任憑怎麼擴大，總是少數人的，不是通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。司馬光的書，給什麼人資「治」呢？無非給這些人罷了！給他們說教，告訴他們用什麼手段纔可以麻醉人民，可以得到人民的愛護，也就是所謂「人和」。孟子的意思，和這個沒有什麼本質的差異，他甚至於說過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」的話，這個是不是就可以證實孟子是民主呢？絕對不可能的，孟子生在封建社會裏，他很難有與這社會本質相反的思想，他跑來跑去遊說諸侯，要這些諸侯貴族行仁政，行王道，也只是爲他們想一個斧底抽薪的統治辦法，可以更鞏固他們的地位罷了。我們應該知道孟子的時代，正是封建社會階層本身在起著變化的當兒，因爲鐵器發明，種田的技術大大進了一步，許多封建地主下的農奴們翻了身，成了知識分子，逐漸掙扎而成了士大夫階級的一員，他們與貴族決裂的實效是顯而易見的。這又犯了幼稚病。雖然歷史裏沒有充分記錄人民大眾的生活，但正可以從帝王和貴族的生活與動靜中，看出農民大眾所受的苦

國，請俟本國之內，頻頻起着內戰，孟子曾說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；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」，這是多麼可怕的現象，所以他提出這麼一個比較緩和的辦法來，想用微溫的人道主義，解消無窮無盡的血腥戰爭，試問這個能夠說服那些「食得無厭」的貴族嗎？故「人和」只是一句空談，不發動人民大眾的力量，一切全是幻想的，爲少數人謀利益的。

社會進展是人民勞動力創造的結果，所以只有人民纔配作歷史的真正主人。過去一切勞動的成果，可以說全被少數人剝奪了，他們侵佔了全部人民的利益，然後拿出一點湯汁來，行什麼「仁政」，博幾聲知識分子的喝采，讓無知的人民念幾聲阿彌陀佛，萬歲爺皇恩浩蕩，這種「人和」我們是不需要的！

過去歷史的任務是如此，所以查遍了汗牛充棟的史籍，很少記載人民大眾的事，只不過皇帝的起居注，大臣將相的行錄，內戰或長時期的血腥錄，有人批評二十四史是「一相斫書」，這是很正確的。（也有人說二十四史，等於二十四部家譜）有些人民起義的英雄，被打入叛逆流寇一類裏去，是應該「剿」、「殺」的。這幾千年來的蒙蔽真厲害，使人民本身也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力量。宋江在梁山泊起義，反抗貪官污吏渾賤政府，施耐庵寫成了一大部有血有肉的小說，在宋史裏卻不過區區數十字，假使沒有小說，這些人民英雄就完全埋沒了。相反，對於那些屠殺人民的例子，只要他們成了功，作了皇帝，代表了封建地主的利益，和他們一道壓迫農民大眾，立刻就可以誦揚德政，把他尊成神功聖德的太祖高皇帝！如此說來，我們簡直可以說三千年來的史冊，全是本末倒置，把真正的強盜當作主人，而把真正的主人看做強盜的。「人和」兩個字，正可以表示出他們的偽裝與真象。

話說到這裏，是不是過去一切歷史都該丟到毛廁坑裏去呢？

這又犯了幼稚病。雖然舊歷史裏沒有充分記錄人民大眾的生活，但正可以從帝王和貴族的生活與動態中，看出農民大眾所受的苦難，這只要我們的立場和觀點正確，就可以從歷史的海裏釣出我們所需要的魚。

（上接四一面）團的同志（也許是解放軍）站了起來，他十分生氣地呼斥着那些鼓掌的觀眾，他喊出來，「人都給逼死了，你們還鼓掌！」

這很明顯地是一個看法和立場的問題，那位同志一定是爲這些觀眾的「袖手旁觀」「隔岸觀火」的態度激怒了。小資產階級在欣賞農民被虐殺的高度成就的表演，鼓起掌來，豈不是最平凡的事。

如果換一個場合，我們在看日本人南京大屠殺的戲，如果表演也是最成功的，我們大約不會有一個人鼓掌了。因爲日本屠殺的是不分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，只要是中國人，他們都殺。階級這個東西，原來真正是那麼明顯的一個存在，決不是什麼虛無飄渺的東西。

爲了重新作人，作一個好好的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工作者，我們怎麼能不取得真實的無產階級的情感呢！

在涼夜的秋風裏，我梳理了這一套雜亂的思路。天上的雲彩已經疏散得差不多了。已經沒有了像鱗片一樣的散碎的雲影，夜空更藍，星星也更亮，這時它靜靜地嵌在那裏，不再奔馳。我的感情也更平靜了。

我很爲這平靜的感情歡喜。我們一起摸索上了路，這是一段漫長的途程，得慢慢地走，步子得踩得定，踏得穩。我們依然是很熟的朋友，這真讓我安慰，因爲我最怕在征途上失去了伴侶。